



农村家庭数字反哺的特征、抗阻因素与 解决路径研究

——基于江西新干县 NY 村家庭代际互动实践

董书华, 夏莹洁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从“数字反哺”的相关理论出发,以江西省新干县 NY 村 8 户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描述了农村家庭代际互动场域中子代对亲代数字反哺的现状。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数字反哺存在以下特征:反哺节点明显,浅层次与反复性并存;同村晚辈帮扶,邻里互哺助力;子代反哺主动性不足。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边缘地位、技术恐慌心理、代际沟通失衡均构成了数字反哺的抗阻因素。基于实地调研,认为跨越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在家庭场域中实施数字反哺,发挥子女的扶持与协助作用,帮助农村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社会;另一方面,须构建政府、新闻传媒、大众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帮助老年人共享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真正惠及全社会。

关键词: 数字反哺;数字鸿沟;农村家庭;老年人;代际互动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4) 06-0314-08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resistance factors, and solution pathways of digital back-feeding in rural families: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practice of families in NY village, Xin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DONG Shuhua, XIA Yingjie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relevant theory of "digital back-feeding", this study takes eight households in NY village, Xin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back-feeding from sub-generations to parent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field of rural famil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igital back-feeding in rural households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bvious back-feeding nodes, shallow and repetitive coexistence; assistanc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neighborhood; weak initiative in back-feeding in offspring. The social marginalization, technological panic psycholog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mbalance of the

收稿日期:2023-07-01 网络出版日期:2024-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XW077);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4C3502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4NDQN176YBM);浙江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3256008-Y)

作者简介:董书华(1978—),女,河北威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方面的研究。

elderly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all constitute obstacles to digital back-feeding.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t is believed that alleviatin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rural elderly groups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digital feedback in the family field, leverage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children, and help rural elderly groups quickly adapt to the digit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jointly built and shared by multiple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news media, and the public, to protect the digital rights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help them share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truly benefit the whole society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Key words: digital back-feeding; digital divide; rural households; elderly peopl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0.5%,而在线教育和互联网医疗普及率分别为 22.5% 和 22.8%^[1]。这些数据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具体行动。在“乡村振兴”及“数字乡村建设”等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农村中作为“数字原生代”的青年子代能够迅速学习并适应数字生活,而农村老年群体受文化水平、经济能力、数字素养等多重因素限制,被排除在数字生活之外,沦为“边缘人”甚至“隐形人”。近年来老年人因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而无法看病、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现象屡屡出现,凸显出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全社会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增强他们在数字化时代的适应能力,促进全体成员共享数字成果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议题。“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由晚辈向长辈传授知识与经验”^{[2]28-29} 的后喻文化到我国学者周晓虹以“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中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3] 来定义文化反哺,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文化在不断重塑着,也凸显出在家庭场域进行数字反哺的迫切性。

一、理论概述

(一) 知识沟与代际数字鸿沟

“知识沟”假说是关于信息社会中大众传播与社会阶层化问题的理论,1970 年由美国学者 Tichenor 等^[4] 提出,他们认为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能够带来知识的增长,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取信

息。Dewan 等^[5] 总结了数字时代知识沟的具体表现,包括由人口特征导致的利用互联网搜寻信息困难的信息沟,缺乏计算机能力的技能沟,无法获取教育或工作机会的经济机会沟,无法参与电子政务的民主沟和无法体验电子商务功能、服务的数字支付沟。

20 世纪 60 年代,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代沟”(Generation gap)一词,认为它是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隔阂^[6]。数字化工具在创造了诸多经济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部分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在数字世界中“掉队”,从而面临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彭兰^[7] 指出,在数字空间中自由通行的年长一辈少之又少,代际数字鸿沟的表现也是代际之间文化的隔阂,并最终形成断裂。代际间的数字鸿沟将造成年长一辈与时代脱节,妨碍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也影响我国社会转型^[8]。

(二) 文化反哺与数字反哺

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是第一个系统描述文化反哺(Cultural feedback)现象的学者,她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即:前喻文化,长辈向晚辈传授知识与经验;并喻文化,年轻一代或者年老一代均在同一代人之间相互学习;后喻文化,由晚辈向长辈传授知识与经验^{[2]27}。1988 年,周晓虹^[3] 首次提出“文化反哺”的概念。此后,中国学者对文化反哺的成因、内容、特定群体和意义进行了研究,如弓丽娜^[9] 认为文化反哺出现的动因在于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转型,中国与全球连接成一个整体,社会中普遍出现年轻一代文化地位上升的情形,造成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颠覆或倒置现象。

数字反哺(Digital feedback)是数字化浪潮中文化反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通常包含子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周裕

琼等^[10]将数字反哺划分为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数字素养反哺三个维度,论证了数字反哺在家庭中的常见性与数字反哺对于弥合家庭数字代沟研究的可行性。周晓虹^[11]发现,在反哺效果层面,存在父母对子女反哺形成依赖并导致父母数字生活能力下降的问题。洪杰文等^[12]对山西陈区村微信使用情况进行调研,证实了农村地区存在更大程度的数字鸿沟,并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传播是数字反哺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微信反哺在家庭内部占据中心地位。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多聚焦城市群体尤其是青少年与中青年代际间,对农村家庭老年群体的数字反哺现象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新媒体软件使用为切入点,关注具体的数字反哺行为,而未将数字反哺置于农村家庭代际互动的语境中。鉴于此,本文选择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 NY 村的 8 个家庭,16 位家庭成员(含子代与亲代),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聚焦我国农村家庭新媒体使用的代际互动,通过个案研究分析农村家庭数字反哺现状、阻碍因素,探索提升反哺效果的解决路径,以促使农村老年群体获得智媒时代必要的生存技能,更快地融入数字生活。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 NY 村作为调查地。该村庄位于新干县西北部,距离县城中心城区约 10 千米。NY 村处于 312 省道和无名湖泊之间,靠近省道,交通便利。村庄地形以丘陵、平原为主,农民常年种植水稻、菜籽、花生、甘薯等农作物。该村庄的主要景观为民居、农田、湖泊、树木。村庄入口处有一家村民经营的农家餐馆,村内的主要街道上有一家出售日用品和粮油的小型超市。此外,村里没有乡村文化礼堂、图书馆等人文设施,缺少公共交流空间。村民喜欢串门聊天,交流空间以村民的家庭空间为主。目前 NY 村共有 40~50 户人家,其中 60 岁以上村民为 87 人,学历以小学、初中为主。80%的家庭年轻的子代在浙江、广东等地工作,老年人留在村庄生活。大多数村民以种植、贩卖蔬菜瓜果为生,少数村民则从事工业生产、货物运输等职业。

虽然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的有关实践已延伸至老中小三代,但在我国多数城市,孙代对祖代反哺效果更为显著。在 NY 村中,绝大多数孙代跟随其父母在外省生活、求学、工作,与祖辈的日常交流较为缺乏,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全家团聚,因此祖辈与孙

辈的关系格外生疏。因此本文认为,在农村家庭场域中,考察中年子代与年长亲代的家庭数字反哺与互动实践更具价值。

本文在选择受访者时,确定子代的年龄范围为 30~50 岁,亲代的年龄范围为 55~90 岁。30~50 岁的子代大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成长起来,对互联网等新兴事物的接触程度较高,目前基本拥有稳定的工作与家庭,且有别于人生观、价值观还不成熟的青少年群体。55~90 岁的亲代大多数成长并长期生活在传统农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受教育程度低,很少接触与使用新媒体设备。

本文选取该村庄的 8 个家庭进行田野观察,每个家庭选取 1 位亲代与 1 位子代,对其进行深度访谈。为了清晰表示各个受访者,下文用“XX”形式的两位字母来表示具体的受访者,其中:第一位字母,用“A~H”8 个字母分别代表第 1 至 8 个家庭;第二位字母,用 F(father)代表父亲,M(mother)代表母亲,S(son)代表儿子,D(daughter)代表女儿。例如,AS 代表参与深度访谈的是第一个访谈家庭中的儿子。受访者的身份、年龄、职业及居住地等信息见表 1。

表 1 NY 村家庭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码	身份	年龄/岁	职业	长期居住地
AM	母亲	87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AS	儿子	49	注塑师	浙江省宁波市
BM	母亲	56	工人	江西省吉安市
BD	女儿	31	幼儿园老师	江西省南昌市
CF	父亲	66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CS	儿子	34	模具加工员	浙江省宁波市
DM	母亲	64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DS	儿子	36	电器设计师	广东省深圳市
EF	父亲	69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ES	儿子	31	外贸业务员	广东省深圳市
FF	父亲	73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FS	儿子	49	私企董事长	浙江省宁波市
GM	母亲	71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GD	女儿	46	私企车间主管	浙江省宁波市
HF	父亲	63	务农	江西省吉安市
HS	儿子	35	美工人员	浙江省杭州市

深度访谈分为两个阶段:2023 年 1—3 月与受访者面对面交谈,4—5 月通过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进行补充访谈。访谈主要围绕亲代对新媒体工具(主要指智能手机)的学习与使用、经历的数字困境、数字反哺的方式与主要内容、代际互动实践的影响、家庭成员代沟弥合等问题进行。经实地调研发现,

NY 村老年群体无论从设备接入、技能掌握还是从数字素养上,都与其子代有较大差距。近十年来,农村亲代与子代两者的数字鸿沟在快速更新迭代的数字化社会中不断扩大。出生在 1970—1980 年的一代人较早接触互联网与智能手机,他们拥有丰富的互联网接触与使用经验。目睹在数字社会“掉队”的父母,他们拥有强烈的意愿在家庭生活中对长辈进行数字帮扶。在对全村展开的普遍调查中发现,有 83% 的年轻一代为父母购买了智能手机或者将自己的二手智能机送给父母使用。

三、农村家庭数字反哺的维度与特征

(一)三个维度

周裕琼等^[11]综合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已有文献,提出了数字鸿沟的三个维度——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认为数字反哺也应包含三个维度,即数字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的分类,如图 1。本文以此为理论框架,对江西省 NY 村的家庭数字反哺现状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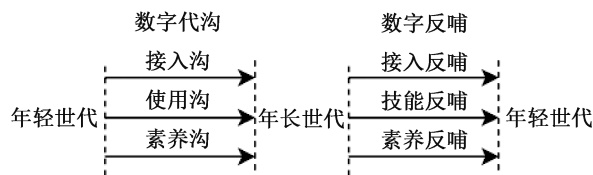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反哺与数字代沟的维度对应关系^[10]

1. 数字设备接入反哺

拥有智能手机是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智媒社会的第一步与物质前提。但是生活在封闭和落后的农村, NY 村的老年人大多受经济条件与传统节俭观念的限制,不会主动购买一部属于个人的智能手机。访谈发现, 8 位亲代都有智能手机,其中有 4 位虽然拥有智能手机,但由于不习惯等原因依然主要使用老年机。至于智能手机的来源, 6 位使用的是子女购买的千元以下的低端智能手机, 2 位使用的是子女淘汰给他们的二手智能机。然而,面对智能手机这一“昂贵”的数字设备,并非所有农村老人都能坦然接受,也有一些因为舍不得花钱等原因拒绝数字设备接入。“我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她嫌贵,而且觉得自己用不着、不会用,竟然自己又跑到那家手机店去退掉了。退掉手机之后还一直唠叨,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面。”(子代受访者 GD, 46 岁)

老年人融入智媒生活的第二步是学会使用手机常用软件。多数子代会为父母购买智能手机,并根

据父母的使用需求下载他们需要的应用软件。访谈中也发现:微信因为可以节约电信通信费这一特性而成为几乎所有老年人群体必备的通讯 App;此外,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也是深受老年人欢迎的娱乐软件。一般子女安装完软件后会教长辈简单的用法,有的子代还会教父母找到下载软件的入口,方便长辈日后根据个人兴趣自由下载,帮助他们接入数字生活。56 岁的亲代受访者 BM 表示:“第一次拿到 OPPO 手机后,女儿一口气帮我下载了微信、抖音、淘宝、支付宝、今日头条等很多软件。我现在能自己去应用商店下载喜欢的 App,前不久刚下载了小红书,这几天就一直在上面看怎么做出美味的饭菜。现在不需要女儿的帮助,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用各种软件了,有时候厂里的同事还会羡慕我,让我教她们用手机。”(亲代受访者 BM, 56 岁)

2. 设备使用技能反哺

子女教授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本身就是赡养行为的一种表现。农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实现初步的数字连通后,子女往往会教给他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数字反哺的各个层次中,技能反哺在传统农村家庭中最为常见。当子代教授父母掌握数字工具使用技能后,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农村老年群体传统的人际交往、日常出行、生活购物等生活方式。以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完成^[13],互联网技术将身处异地的亲代与子代即时连接,弥补了子女不能在父母身边孝养的遗憾。“因为我的工作在南昌市,所以不能和父母常常见面,我远程教他们用手机,除了在微信上打视频电话,有时候我还会给他们转发一些知识或者实用的信息。”(子代受访者 BD, 31 岁)

在子代教学与亲身示范后,学习能力强、接受能力快的农村老年人能够独立地进行微信聊天、拨打语音与视频电话等简单的操作。但当他们面对更为复杂的操作界面时依旧会不知所措。那些身体机能差、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弱的老年人更是难以应付智能手机复杂的使用情境,有的甚至直接关掉手机。“我也不知道按到了什么,有时候手机就会突然跳出来一连串图片或者窗口,我搞不懂这些东西。如果儿子在旁边,我就会去问他;如果没有,我又怕乱按的话搞出什么麻烦,就直接关掉手机不管了。”(亲代受访者 FF, 73 岁)

NY 村大多数子代没有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平日里无暇教授父母,这为老年人的数字学习增加了障碍。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简化中间流程,子代常常

会越过“教学”这一过程,直接上手帮忙解决,譬如下载软件应用、绑定银行卡、设置联系人、注册微信账户等等。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大多数亲代在遇到手机操作问题时,担心打扰子女工作,一般会等到下次见面时再请教。如71岁的GM说:“新冠疫情感染期间,我没有健康码,每次出门办事都带着身份证。但有时候必须要用健康码,我女儿就在手机上帮我搞了一个可以出示健康码的东西,具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反正她会帮我搞定的。”“我的手机好像是装太多东西了,总是很慢很卡,但我又不知道怎么搞好,所以我就每次等到节日儿子回来的时候去问他,他就会一次性帮我搞好手机”。(亲代受访者GM,71岁)但是家庭反哺缺失了“此时此地”的场景,回不到当时遇到问题时的具体情境,影响了老年群体数字技术学习的连续性。

3. 数字媒介素养反哺

素养反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老年人数字技术使用的质量。农村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场域中使用数字设备的经历并不多,对数字技术内部的运行逻辑、社会影响等深层观念也不甚了解。研究发现,在财务交易上较为保守的老年人更加信任常规的银行存款,而对电子银行的安全性心存怀疑与警惕,子女的亲身示范和现身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人对电子支付的抗拒态度。69岁的EF的态度转变颇具代表性:“我刚用微信的时候总是担心里面的钱万一哪天就没了,后来儿子教了我很多遍怎么转账、怎么把钱通过手机转存起来,用久了我现在觉得特方便,也不用大冬天跑到银行去取钱了。”(亲代受访者EF,69岁)

农村老年群体对网络风险缺乏足够的认知,容易掉入电信诈骗和网络谣言的陷阱;平常热衷于获取养生健康信息的老年群体,对疫情谣言的评估能力较弱^[14]。农村老年群体喜欢在抖音、快手平台观看短视频来消遣娱乐。但他们通常对短视频的真实与虚假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短视频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的。如56岁的女性亲代受访者BM陈述:“我比较喜欢在抖音里看婆媳之间故事的视频,还会刷到很多农村里面的家庭故事和一些搞笑的视频,真的停不下来。我女儿给我讲抖音里面很多富二代、网红都是假的。”(亲代受访者BM,56岁)不辨信息真假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电信诈骗的目标。此外,基于算法逻辑的短视频平台推送的大量同质化信息,不仅加深了老年群体的信息茧房,也增加了他们沉迷网络的风险。面对如此情形,子女应告知老

人电子诈骗与网络沉迷的陷阱,进行善意疏导与规劝,避免因网络短视频伤害父母的经济生活、身体健康与家庭关系。

(二)三个特征

1. 反哺节点明显,浅层次与反复性并存

根据贝克尔^[15]的家庭生产理论,家庭生产决策行为主要受时间与货币性收入这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而家庭成员会通过这两种资源的适度调配来实现家庭生产行为效应最大化。承担着家庭经济重任的农村子代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城市工作,父母留守家乡。这造成了子代在日常生活中数字反哺亲代的次数少、周期长。外出工作的年轻人只有在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日才能回家探亲,因此,农村家庭内的数字反哺存在明显的节假日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节点是春节,每逢过年,在外工作的子代返回故土,一家人得以团聚,而数字反哺也多发生在这一较长的节假日期间。

儿子之前给家里买了一个智能电视,好像是可以随便调频道,也能看直播,但是我不会搞这些东西,有时候还把电视搞黑屏了。我嫌麻烦,也不打电话问儿子。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春节几天,只有这时候他才回来,我有机会问他电视具体怎么搞。没办法,两代人不住在一起就是很麻烦。(亲代受访者EF,69岁)

除此之外,农村家庭内的数字反哺还存在教学的浅层次与反复性特征。子代对亲代的数字反哺基本停留在为父母购买智能手机与基础使用等较为粗浅的层次上,对亲代在数字文化与算法逻辑上的理念反哺则较为少见。老年群体通常难以一次性学会新媒体工具的使用技能,需要子代反复教学。

2. 同村晚辈帮扶,邻里互哺助力

研究发现,家庭内部是数字反哺发生的极佳场域,但并非唯一渠道。当大多数子代离乡工作后,独自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大多处于消息闭塞、孤独寂寞的状态。当遇到智能手机使用难题时,他们只能向村里邻近的年轻人或同族的晚辈寻求帮助。这些人临时承担起数字教辅者的角色。正如87岁的受访者AM说:“因为我只会接电话、不会拨电话,所以每次想和女儿说话的时候就会去找隔壁小妹帮忙。我家后门走出去就是她家,走路一分钟都不用,特别近。再加上小妹也是大学生,懂得肯定比我们老太婆要多。我们两家很熟,有时候他们还会用他们自己的智能手机帮我给女儿拨打微信视频电话,挺感谢他们的。”(亲代受访者AM,87岁)这种建立

在地理位置、亲缘关系等基础之上的差序格局体现了乡村熟人社会中的媒介设施共享机制,有助于农村老年人数字接入、获取信息、共享数字社会之便利。

3. 长效心态匮乏,子代反哺主动性薄弱

农村家庭中,多数子代会指导长辈使用微信聊天、移动支付等常用软件,也常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他们很少详细讲述抖音、微信等 App 使用的安全隐患,忽略了父母数字素养的养成。长此以往,农村老年群体即使会操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慧设备,却依旧不懂得背后的运行原理,甚至陷入数字平台与资本的陷阱当中。对于工作繁忙、与父母分居两地的子代而言,反复教学客观上确实存在困难,因此导致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难以提高。“我确实很少主动教我爸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因为我爸平时也不会主动来问我手机上软件怎么用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没啥问题,不需要我去教。再加上我平时工作真的挺忙的,如果我爸不主动提起,我怎么会知道他遇到了问题。”(子代受访者 HS, 35 岁)

成年子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外出工作中,鲜少主动关注亲代的精神状态与数字工具使用情况;与此同时,孤寂伶仃的农村老人不愿打扰子女生活,主动减少日常交流。子代主动反哺的匮乏与亲代日积月累的数字疏离相交织,为农村老年群体增加了数字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多重困难。

四、数字反哺的抗拒因素与解决路径

推陈出新的数字产品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矛盾在持续扩大。数字反哺是需要长期进行的家庭与社会行动,且这一命题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及文化传承息息相关^[16]。本文通过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村家庭的数字反哺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抗拒因素。

(一)抗拒因素

1. 农村老人的数字回避心理

子代帮助亲代接入及使用智慧工具通常能够极大地促进交流,给生活带来便利。但并非所有农村老年人都有接受数字反哺的主观意愿。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资讯及工具,观念保守的老年群体大多产生了一种技术恐慌的心理,甚至主动选择“数字断连”。

第一,部分农村老年群体虽有数字学习的动机,但在实际工具操作中发现并非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学习,技能如果没有明显提高,他

们就会对自身的数字学习能力产生怀疑。子女教学的热情渐渐褪去,老人的学习信心也趋向低沉消极。久而久之,他们会拒绝接入数字世界。

第二,农村老年群体是否接受数字反哺还与其对新媒体工具的风险感知度息息相关。长期居住在生活中宁静、规则简单的农村,他们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视作一种不确定性高、潜藏着风险的陌生事物,对数字生活的排斥主要源于设备价格高昂、容易损坏、伤害身体、长期的费用支出、网络诈骗频发等。在传统观念与新兴媒介冲击的影响下,还未做好准备的部分老年人内心无所适从,对新环境、新技术、新工具倾向于采取回避态度。

2. 传统家庭权力关系倒置导致代际关系失衡

农村老年群体大多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弱,接受数字反哺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子代容易在屡次教学受挫后产生消极情绪。子代的耐心不足、亲代的不以为然、双方理解出现偏差都会导致交流中的情绪激化,使得数字反哺过程中断。在家庭场域中,代际互动中的亲子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字反哺的效果。父母是否接受子女的“指点”常常与子女“说了什么”无关,而与“怎么说”关系密切^[11]。数字反哺过程中的矛盾激化在部分权威型的老年人身上更为明显。他们在知识接受上处于弱势,但固守“面子至上”,认为接受子女教育与昔日的家长身份不相匹配,因此常对子女的讲解持质疑或傲慢态度,这就会使数字反哺的效果大打折扣,不仅对日后长远的数字教辅过程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会破坏家庭关系的和谐。HS 这样描述因教父亲使用手机而引发的冲突:“小时候,我爸就对我很严厉,虽然他现在用手机的过程中遇到麻烦会来问我,但总是带着命令的语气,让我感觉不太舒服。而且他学会手机后,每天刷抖音刷得停不下来,我想去说说,他大吼‘关你什么事’。”(子代受访者 HS, 35 岁)

(二)解决路径

1. 政府与制度:顶层关怀设计

首先,从设备接入层面,我国应努力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出台相应的政策以缩小数字鸿沟。部分农村老年人仍因没有移动通信网络、数字电视等设备而被隔绝在数字世界之外,因此有必要继续提升乡村地区网络覆盖程度及其通信质量。其次,老年人接入数字生活后,还要注重互联网信息安全问题。面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面向农村老年群体的网络诈骗,国家应立法对电信网络诈骗重拳出击,还乡村一片晴朗、绿色的网络

空间。同时,国家还可以加强对老年群体有关甄别与应对网络诈骗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增强他们的识骗防骗能力。概言之,要加快老年人数字化教育立法,充分保障老年人接受正规数字教育的权利。第三,亟需推进智能产品适老化设计的完善。2021年我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考虑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特殊性,加强数字设备、数字服务信息交流无障碍建设^[17]。国家应把适老化数字设计纳入农村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如移动支付、公共出行、医疗就诊等领域,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友好、更包容的数字生活。例如,微信App中的“关怀模式”可将界面中的字变得更大更清晰,从而方便老年人的阅读及按钮点击等操作。最后,公共服务部门要坚持为无法融入数字社会的群体提供非数字化服务,保留线下服务窗口,提供充满温度的人工服务。

2. 传媒与社会:构建数字适老环境

除了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传媒与社会的帮扶也至关重要,这关乎能否成功营造一种包容、开放、尊老助老的社会氛围。首先,新闻传媒不仅要为农村老年人使用数字化工具的现实困境呈现给公众,更应突出其背后动因、未来措施等更具实际价值的部分,倡议社会大众以切实行动对农村老年群体进行数字帮扶。其次,当前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仍然面临多重困境,需要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工程,将分散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搭建体系完整、规则明确的助老团体与平台。比如,由蚂蚁集团发起的“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动”充分整合了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深入各个街道与社区,为老年群体普及预防电信诈骗知识,在“公益”和“助老”两个层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由于拥有相似生活体验与心理模式的同辈老年人,能够更加感受彼此对于数字使用的愿望与需求,因此提倡“银龄互助”模式,发挥同辈帮扶的互助力量,也是老年群体走出“数字孤岛”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3. 家庭反哺:提高老人数字效能

相较于国家与社会,家庭才是数字反哺的核心场域。弥合数字鸿沟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家庭。对亲代而言,克服技术恐慌与自卑心理、主动融入数字社会,这是积极老龄化和提高老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前提。首先,亲代不应受到传统的尊卑观念和等级秩序束缚,而是要谦虚听取子女关于智能设备使用方面的指导。其次,亲代

可以在子代教学后主动尝试电子支付、网上挂号等操作,逐步打消故步自封、自我怀疑的消极情绪,建立稳定的自我效能感。最后,老年群体还可以向邻里、好友等同辈老人学习,包括效仿活跃在互联网上的“银发网红”。像美国的数字包容计划就是让先学会数字使用的老年人去指导其同辈^[18]增强数字技能,丰富使用场景。总之,农村老年人的主动尝试有助于自身切实体验到数字生活的便利,进而充满信心地融入日渐智慧化的数字社会,唯有如此,才能建设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无论从伦理道德、亲子关系还是实际生存的角度来讲,子女对父母数字反哺是他们应尽的家庭义务与社会责任。子女应尊重父母,在父母听不懂或者不会操作时耐心地教学,在理解长辈实际需求与兴趣之后进行针对性辅导,并坚持反复、长期、多维度的教学,以达到良好效果。虽然日常生活中子女可为父母代理操作若干难题,但要警惕代理反哺可能会导致父母的依赖心理。因此,子代要坚持对父母进行实际的数字工具使用技能与操作教学,重视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在数字社会独立生存的能力。最后,随着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孙代逐渐成长,子代还可以鼓励孙代主动关心祖辈并对他们数字反哺,这种隔代反哺既能减轻工作繁忙的子代的压力,又能促进老中小三代关系的亲近与和睦。

五、结 语

当下,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迭代融合交织,处于数字弱势地位的农村老年群体与拥有熟练的数字使用能力的子女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与此同时,数字媒介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物质性存在。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反哺,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实现全民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数字生活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目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我国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此次调查深入地地理位置偏僻、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江西农村,通过考察NY村家庭代际互动实践,揭示了农村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特征、抗拒因素,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设性地提出了帮助农村老年人摆脱数字融入困境的解决路径。本文认为,在家庭场域中日常进行的数字反哺是“润物细无声”的实

践,也是帮助农村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社会、提升老年人数字化适应力与胜任力的关键。弥合数字鸿沟除了依赖家庭代际数字互哺之外,还需构建政府、新闻传媒、大众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帮助他们共享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真正惠及全社会。当然,本文仅讲述了农村家庭数字反哺“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以及“怎么办”(how),没有进一步考察家庭反哺之后的长期效果,也没有对城市与乡村的家庭数字反哺做出详细的比较,但这两个都是颇为重要的议题,希望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3-08-28)[2023-09-22]. <https://www.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2]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M]. 周晓虹,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3] 周晓虹. 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 青年研究,1998(11):22-26.
- [4] Tichenor P J, Donohue G A, Olien C N.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0,34(2):159-170.
- [5] Dewan S, Riggins F J. The digital divide: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2005,6(12):298-337.
- [6] 周裕琼. 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2):117-123.
- [7] 彭兰. “健康码”与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J]. 现代视听,2020(6):1.
- [8] 王艳玲,姜怡宁. 老年数字鸿沟之痛及弥合之径[J]. 新闻爱好者,2021(7):31-34.
- [9] 弓丽娜. 现代社会中的青年文化反哺现象探析[J]. 道德与文明,2004(4):68-72.
- [10] 周裕琼,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0,42(3):6-31.
- [11] 周晓虹. 从颠覆、成长走向共生与契合:文化反哺的代际影响与社会意义[J]. 河北学刊,2015,35(3):104-110.
- [12] 洪杰文,李欣. 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J]. 国际新闻界,2019,41(10):50-74.
- [13] 李慧娟,喻国明. 家庭场域的数字化重构: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空间的功能异化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3):7-11.
- [14] 周裕琼,杨洗,许广梅. 新冠疫情中的数字代沟与健康代沟:基于 2018 年与 2020 年中国家庭祖孙三代的问卷调查[J]. 新闻与写作,2020(10):21-29.
- [15] 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61-163.
- [16] 周裕琼. 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 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 新闻与写作,2015(12):53-56.
- [17]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 (2021-11-05)[2023-09-22]. http://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18] Williams A L, Merten M J. Family: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family context[J].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aserch Journal,2011,40(2):150-170.

(责任编辑:何淑燕)